

浙江文叢

邵晉涵集

〔第一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邵晉涵集

〔第一冊〕
爾雅正義（一）

〔清〕邵晉涵 著 李嘉翼 祝鴻杰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點校前言

邵晉涵（一七四三—一七九六），字與桐，一字二雲，浙江餘姚人^{〔一〕}。以《禹貢》三江中的南江從餘姚入海，遂自號南江。先世顯于北宋，居洛陽，後隨王朝南渡，定居浙東。餘姚邵氏乃詩書相傳之家，世代屢有科第之舉。高祖邵琳，明進士，官山西洪洞知縣。曾祖炳，縣學生。族祖廷采，清初著名學者，擅長史學，曾問學于黃宗羲，後長期主講姚江書院，有《東南紀事》、《西南紀事》、《思復堂文集》等著作傳世。祖父向榮，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）進士，曾任內閣中書，後爲定海、鎮海教諭，著有《冬餘經說》，雜釋諸經。父佳銳，增廣生，博覽群書，尤喜讀《易》，爲文不隨流俗。母親袁氏，幼稟家學，知書達禮，嫺熟前明史事掌故。浙東自古人文薈萃，文化發達，『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，以道學顯，而功業風義兼之。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，大節凜然。及其弟子黃梨洲先生，覃研經術，精通理數，而尤博洽于文辭。君生於其鄉，宗仰三先生，用爲私淑』^{〔二〕}。優良的學術環境，先賢的榜樣力量，奠定了其堅實的學術根基。

邵晉涵自幼羸弱多病，左目微眇，然天資聰穎，博聞強識，勤奮用功。爲祖父鍾愛，『親課讀於鎮海學署』，經嚴格的訓導，學問日進千里。四五歲時便知『六義』、『四聲』，七歲時能賦排律五十韻，十二歲即能遍通《五經》，爲詩操筆立就，有『神童』之譽。稍長，益涉獵，四部七

錄，均有所研究，於書無所不讀，尤能推求本原，實事求是。十七歲，邵晉涵補爲縣學附生，履試優等。乾隆三十年秋（一七六五），參加浙江鄉試中舉，名列第四，文章對答甚得副考官錢大昕賞識，云：『五策博洽冠場，僉謂非老宿不辦。及來謁，才逾弱冠，叩其學，淵乎不竭。予拊掌曰：「不負此行矣。」』^{〔三〕}乾隆三十六年春（一七七二），參加辛卯恩科禮部會試，榮登榜首，殿試二甲，歸部銓選，『海內有識者咸曰：數十科來，無此才矣。』^{〔四〕}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），詔開《四庫全書》館，經大學士劉統勳薦舉，以翰林院庶吉士身份充纂修官，與戴震、周永年、余集、楊昌霖一同參加《四庫全書》的編纂工作，時人號稱『五徵君』，次年授編修職。邵晉涵精于史學，凡史部圖書，多由其主持編定，提要大部分也出乎其手，『總裁倚爲左右手，朝廷大著作咸預討論』，時人言經學推重戴震，講史學則推重邵君^{〔五〕}。這以後，除兩次南歸服父母喪、一次充任廣西庚子科鄉試主考官外，邵晉涵一直在京從事文獻的整理工作。乾隆五十六年（一七九一），御試翰詹諸臣，名列二等，擢升爲左中允，後又遷侍講，轉補侍讀，歷左庶子、翰林院侍講學士、日講起居注官，並兼文淵閣直閣事。又任咸安宮總裁，《萬壽盛典》、《八旗通志》、《國史》館、《三通》館纂修官，并任《國史》館提調，兼掌進擬文字。前後任職史館十餘年，名卿列傳，皆出其手，編纂中能據事直書，未嘗阿諛瞻徇。邵晉涵長期兼職諸館，晨入暮出，勞累過度，加之先天體質較差，以致積勞成疾。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六月，終因感染寒疾，誤投庸醫，溘然長逝，享年僅五十四。邵晉涵英年早逝，是學術界重大損失，震動朝野。王昶云：

『學士邵君之卒也，卿大夫相與悼於朝；汲古通經、博聞宏覽之儒相與慟於野，而大臣之領國史者，迄今尤咨嗟太息，重惜其亡。』^{〔六〕}章學誠歎曰：『浙東史學，自宋元數百年來，歷有淵源，自斯人不祿，而浙東文獻盡矣。』^{〔七〕}

邵晉涵有良好的品德。居家孝友，執親喪哀毀骨立；于人忠信，與朋友處『溫溫然，恂恂然』^{〔八〕}，始終如一，未嘗以博雅自矜，篤於故舊，久要不忘。章學誠曾困頓科場，在京貧病交加，舉目無親，邵晉涵把他接到家裏，延醫救治，生活上給以幫助，學問上啟發砥礪，情同手足。邵晉涵歿後，章學誠傷感道：『惟於余愛若弟兄，前後二十餘年，南北離合，歷歷可溯。得志未嘗不相慰悅，至風塵潦倒，疾病患難，亦強半以君爲依附焉。』^{〔九〕}邵氏的赤誠，濟人於危難之間的古道風範，令人贊歎。在學問上，則淵博精深，好學不倦。『獨善讀書，數行俱下，寒暑舟車，未嘗頃刻輟業』^{〔一〇〕}，『詩文操筆立就，淵博奧衍，自成門戶』，『議論史事，上下古今，則飄然風舉，凡古來政事之得失，人才之消長，君子小人之玄黃水火，莫不決其弊之所由始，與害之所由終』^{〔一一〕}。由於他的高尚道德和淵博學識，使他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學友，誠如朱筠所云，『今士之績學者，莫不與之遊』^{〔一二〕}。當時著名的學者如阮元、紀昀、王念孫、汪輝祖、洪亮吉、段玉裁、戴震、盧文弨、王鳴盛、汪中、孫星衍、焦循、李文藻以及朱筠、錢大昕、畢沅、王昶等，與二雲或友或師，或師友相間，他們相互切磋探討，使其學問不斷開拓精進，『先生負絕人之姿，讀書三數過，終身不忘。爲文章，操筆力就，承戴山、南雷之傳；又出錢曉微詹事之門，而客於朱筠

河學士使院，益擴其學，識奧博而精」^{〔一三〕}。與此同時，他的道德文章，也吸引了莘莘學子前來拜師討教。邵晉涵亦樂意以師道自任，服官之餘，即以授徒爲業，『執經者嘗林立以待』^{〔一四〕}，『君隨問曲諭，人人皆得其意』^{〔一五〕}，弟子多至數百人。著名的有孫爾準、戴聯奎、章貽選、朱錫庚等。其中孫爾準，嘉慶十年進士，官至閩浙總督，『得師經史之學，敷爲章奏』；得師文藝，作爲詩歌；得師立品之超、見事之明，以核官行軍，卓然燭古大臣風烈」^{〔一六〕}，是邵氏之緒業，爾準盡得其傳。然而對於權貴，邵晉涵卻持相反的態度，『性狷介，不踏權要之門』^{〔一七〕}。當時，權相和坤曾想延攬其作他兒子的塾師，邵晉涵堅辭不就，和坤愧曰：『吾非必相強，邵君何爲此悻悻！』^{〔一八〕}由此可見邵晉涵不肯媚事權貴的錚錚風骨。因此，『迴翔清署二十餘年，而官止四品』^{〔一九〕}，個中原因與其耿介廉正的性格不無關聯。對此，摯友章學誠深有體會：『君以才學爲權要人所知，稍誘進之。君毅然弗屈，故以是齟齬終身，君不自恤也。』^{〔二〇〕}邵晉涵儘管官品上不算顯達，但他的才華和人格魅力，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，贏得了時人的尊重。阮元云：『邵二雲先生，以醇和廉介之性，爲沈博邃精之學。經學、史學，竝冠一時，久爲海內共推。』^{〔二一〕}錢大昕云『以懿文碩學，知名海內』，其銘詞又云『名冠南宮，書校東觀。爲真學士，爲良史官』^{〔二二〕}。陳壽祺云：『詔徵天下博洽通才五人，參預編摩，授職詞垣，而餘姚邵二雲先生與休寧戴東原先生，爲之冠天下。士大夫言經學必推戴，言史學必推邵，當時以爲篤論云。』^{〔二三〕}這些評論，絕非溢美之辭，客觀地反映了他在學術界的影響。

邵晉涵在半百人生裏，勤奮刻苦，於學無所不通。除經、史諸書外，旁及金石、方志、目錄、輯佚、校勘、編纂學諸領域，爲中華文化的傳承作出了巨大貢獻。令人遺憾的是，由於僅得中壽，生前的許多著述計劃未及完成，美志未遂；再加上整理不及時，已有的零稿殘篇又散佚不少。儘管邵晉涵一身著述豐富，但流傳下來的並不多。今傳者有《爾雅正義》、《南江札記》、《南江詩鈔》、《南江文鈔》、《續通志·金石略》、《舊五代史》、《舊五代史考異》、《四庫全書目錄提要史部分纂編》等數種^{〔二四〕}。傳記資料中著列的《孟子述義》、《穀梁正義》、《韓詩內傳考》、《輶軒日記》、《方輿金石編目》、《皇朝大臣謚跡錄》、《宋元事鑒考異》等，至今已湮沒不傳。而未竟之作則有《南都事略》以及由《宋史》改編而成的《宋志》等。此外，他還參加過纂修《續資治通鑒》、《八旗通志》、《杭州府志》、《餘姚縣志》等書。

此次整理的《邵晉涵集》，由《爾雅正義》、《舊五代史考異》、《南江詩文鈔》、《南江札記》四書彙集而成，是邵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。本書的整理出版，將有助於讀者瞭解邵氏的經、史學和文學創作成就，爲乾嘉學術研究提供第一手基礎資料。

《爾雅正義》係邵晉涵經學代表作，雅學研究集大成者，也是他生前唯一刊刻的著作。《爾雅》乃訓詁著作，以訓釋詞義和考證名物爲主要內容，歷來經學家常用來解釋儒家經義，有『六藝之津梁』之稱。鑒於《爾雅》難讀難懂，甫一問世，爲之作注者代有其人，最爲通行的是晉郭璞的《注》和北宋邢昺的《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《爾雅》即是郭《注》邢《疏》本。然二者

均有不足之處，郭注復多脫落，俗說流行，古義寢晦。邢疏則掩襲《毛詩正義》爲己說，間采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正義，亦多淺陋不稱，難爲典據，時南宋人已不滿其書，後取列諸經之疏，聊取備數而已。邵氏由是殫精竭慮，重新注疏。以唐刻石經、宋槧本以及諸書所引爲據，審正經義。以郭注爲宗，旁采諸家之說、舊注逸文，廣采博納，補充郭注未詳未備，擴大詞義引證範圍。就字音以求古義，推求字原。辨別草木蟲魚鳥獸之名，詳其形狀，使名實相副，正古今沿襲之誤。前後十三年，三四易稿，於乾隆五十年（一七八五）撰成是書。邵氏《正義》多所成就發明，構建了清代疏注《爾雅》的基本框架，實爲清代注疏群經的先驅，頗爲時人和後世推重。

《爾雅正義》的版本系統，脈絡清晰，行世者有二：一爲餘姚邵氏家塾面水層軒刻本；一爲阮刻學海堂《經解本》。最早的刻本爲乾隆戊申（一七八八）邵氏家塾本，扉頁有『乾隆戊申年夏新鐫餘姚邵氏家塾本面水層軒藏板』等字樣，書還附有刻工名云『琉璃廠西門內金陵文炳齋劉德文鐫刻』。由於原刻本錯誤繁多，脫漏不少，邵晉涵不甚滿意^{〔二五〕}。書刊佈後，時人紛

紛勘正，出現不少校補本。今南京圖書館藏本，在目錄『釋畜』後有『己酉重校』字樣，顯然爲隔年重校本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即據此影印出版。此外，上海圖書館藏清張敦仁校本、顧觀光批校本、宋保批校本，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錢侗校並跋本，福建省圖書館藏清謝章鋌校並跋本，湖北省圖書館藏清甘元煥跋並錄清汪士鐸批校本，江蘇省寶應縣圖書館藏清戈襄校並跋本等^{〔二六〕}。《家塾本》除《爾雅正義》二十卷外，常與陸德明《爾雅釋文》三卷合爲一函。該本易

獲，除上列館藏外，國家圖書館、天津圖書館、江西省圖書館、浙江省圖書館以及北大、浙大、人大、杭師大等十數家圖書館均有收藏。至於學海堂本，係阮元于道光年間在廣東所刻的《皇清經解》本。該本採用己酉重校本刊刻，故兩者文字出入不大。到了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，英軍攻粵，學海堂書籍板片毀失過半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，兩廣總督勞崇光等捐資補刊數百卷，因此，《爾雅正義》也有了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補刻《皇清經解》本。《經解》本後來多有翻印，如清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上海書局石印巾箱本、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上海點石齋石印本、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上海鴻寶齋石印本、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上海古香閣本等。現代也有多家書坊影印出版。本書的校勘，以餘姚邵氏面水層軒刻本為工作底本，以學海堂經解本為參校本。鑒於通行易得，便於覆按，底本較善之故，面水層軒刻本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見經部一八七冊；經解本則據上海書店一九八八年影印出版的《皇清經解》本，見第三冊。

《舊五代史》是《二十四史》中唯一的輯佚書，現在的通行本是清乾隆年間邵晉涵在修《四庫全書》期間，從《永樂大典》、《冊府元龜》等書中輯錄而出。在補輯、恢復《舊五代史》的同時，邵晉涵依照裴松之《三國志》的注釋體例，從其他史籍、類書、宋人筆記、文集、方志、碑碣等八十餘種典籍文章中蒐集材料，撰成《舊五代史考異》五卷，與正文相互補充印證，考證綿密，最見乾嘉考據之學的風範，為研究五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。本書點校即以國圖藏清面

水層軒藍墨格鈔本爲底本（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二九〇冊），在整理過程中吸收了前賢時彥的成果。

邵晉涵精研經史，亦工詩文，《南江詩文鈔》係《南江詩鈔》《南江文鈔》合集。邵詩不事摹擬，旨歸雅音，古今皆善，峻潔有體。或清新自然，或委婉含蓄。長篇歌行，益臻勝境，硬語排憂，比肩昌黎。其文則包含應制、賦、擬疏、記、序、書、傳、祭文、行狀、墓誌銘、策問、考、跋、提要諸體，語氣平和，辭旨溫厚，文采斐然。張舜徽歎云『予嘗謂乾嘉諸儒能爲考證之學，多不能爲考證之文，能兼之者，殆不數人，晉涵其佼佼者矣』，充分肯定邵文根于經史，沖和淵懿，奧衍奇古，功力至深的一面。版本方面，《南江文鈔》有嘉慶年間刊四卷本和道光年間刊十二卷本，《南江詩鈔》有嘉慶年間刊十卷本和道光年間刊四卷本。本次整理以浙江圖書館所藏嘉慶八年邵氏面水層軒刻、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胡敬印本爲底本，收《南江文鈔》十二卷，《南江詩鈔》四卷，計十六卷。

《南江札記》則是邵氏閱讀古書時的點滴心得，合爲卷四，總計七八七條。其中或闡明經義，或校對文字、考辨史實，少者隻言片語，多者幾近千言，條分縷析，探賾索隱，頗多發明。漢末以降，鄭玄的《三禮記》一直被奉爲圭臬，而本書《儀禮正誤》卻屢摘其誤。考證《三禮》部分，亦多駁正鄭說，存信存疑，不主觀臆斷，充分反映了他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。邵氏曾計劃撰著《穀梁正義》、《孟子述義》二書，可惜因過早逝世而未成。本書《穀梁傳》和《孟子》部分，

皆博引眾說，不輕下己意，很可能就是兩書的一些草稿。本書係邵氏卒後由其子秉華從遺稿中輯刊而成。主要版本有邵氏面水層軒刻本〔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影印，收入《清人考訂筆記（七種）》〕、《紹興先正遺書》本、《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》本，其中面水層軒刻本最佳。本書即以清嘉慶八年癸亥歲（一八〇三）邵氏面水層軒刻本爲底本點校，參校了中華書局影印本和《紹興先正遺書》本。

此次點校整理工作包括標點、分段、文字處理、校勘等。概括來說，遵循下列幾項原則：

一、標點符號依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，並結合文獻整理工作中《通則》對全書進行規範的標點。但全書不使用專名號、省略號、破折號、著重號和連接號。邵氏著作中引用典籍極多，所以書名號的使用很廣泛、複雜。本次整理對書名號作如下統一處理：

（一）凡所引篇名有『篇』字者，均將『篇』字標在書名號內，篇名與書名間加間隔號。

（二）書籍的統稱不加書名號，如『五經』、『四書』，單部書籍簡稱則需加書名號，如《毛詩》、《說文》，叢書名需加書名號。

（三）尤其是十三經各自的篇名，如引《周易》的卦辭、彖、象等，其卦、彖等皆應作爲篇名處理，單列而引用其義，均加書名號。又如引用《周禮》時，各職官名皆作爲篇名。非引用其文，而僅述說該職官職能時該職官不作爲篇名。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加年份的標點一律作《左傳·某公某年》（其他的例此）。若直接引用某公某年文字而省略前書名的

者，則某公某年應加書名號。至於如《左氏某公某年傳》之類，其間不加間隔號。

(四)傳、箋、注、疏、正義等作注釋放在引文後，皆不加書名號，以免繁瑣。

關於引號

(一)原原本本引用者及刪略引用者，加引號。舉其大意者，一般不加引號。

(二)凡直接引用的文字用雙引號表示，若引文中復用引文，則加單引號。

(三)凡引號、冒號俱全的，引文末尾標點置於引號內，凡只用引號不用冒號的，引文末尾標點置於引號之外。

(四)引文含經、注、疏等多層次的内容，使用引號，以清眉目。凡注文中引用經文原文或疏文中引用經、注文原文，皆使用引號。凡經、注、疏文中引用其他典籍之文，皆使用引號。

二、文字處理

(一)底本中的古今字、異體字、俗體字、通假字均按原文，不作改動。

(二)版刻混用字、形誤字，如日、曰、己、巳、已之類，逕改爲規範字，不出校記。

(三)因避諱而缺筆的字，逕改補正，不出校。避當朝諱，字不作改動。如避前朝諱，第一次改時出校，後類似情況不再出校，逕改。

三、校勘

(一)底本與校本文字不同，一般不改動底本原文。若底本文字確實有誤，則根據參校本

文字，出校記說明。

(二) 出校原則：底本原文，凡文字兩通而涵義不同者，可出異文校記。一般虛字有出入，文義無殊者，不出校記。底本異文，出校從寬，他本異文，出校從嚴。

(三) 校記置於卷末，以橫綫區隔。校記的序號置於被校勘的字、詞或句的末字右上角，校勘行文只錄該被校的字、詞、句，不錄前後無關的文字。

(四) 校記按統一格式撰寫，力求簡潔。

四、爲便於瞭解其人其書，我們揀擇了與邵晋涵相關的傳記、墓誌銘、生平事蹟、著述考；與《爾雅正義》相關的提要、序跋、往來書信、評述文章等，勒爲一輯，作爲附錄，列於書後，供學者參考研究。黃雲眉編撰的《清邵二雲先生晋涵年譜》是研究邵晋涵的重要參考資料，按理當納入附錄，考慮到隨便刪改，掠人之美，是對原著者不敬之舉，故附錄未輯錄年譜資料，特此申明。

學疏識淺，缺漏必多，敬祈博雅君子，批評指正。

李嘉翼

二〇一五年元月於杭州師範大學

注釋

〔一〕關於邵晉涵的傳記，參看趙爾巽等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《邵晉涵列傳》；《清史列傳》卷六十八《邵晉涵傳》；洪亮吉《卷施閣文甲集》卷九《邵學士家傳》；章學誠《章氏遺書》卷十八《邵與桐別傳》；江藩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卷六《邵晉涵傳》；汪兆鏞編《碑傳集》卷五十；周駿富編《清儒學案小傳》卷十《邵先生晉涵》；李元度《國朝先正事略》卷三十五《邵二雲先生事略》；黃雲眉《清邵二雲先生晉涵年譜》。

〔二〕王昶《春融堂集》卷六十，《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》。

〔三〕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四十三，《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》。

〔四〕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三，《贈邵冶南序》。

〔五〕邵晉涵《南江文鈔》，陳壽祺《南江詩文鈔序》。

〔六〕王昶《春融堂集》卷六十，《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》。

〔七〕章學誠《章氏遺書》卷五，《與胡維君書》。

〔八〕王昶《春融堂集》卷六十，《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》。

〔九〕章學誠《章氏遺書》卷十八，《邵與桐別傳》。

〔一〇〕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四十三，《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》。

〔一一〕王昶《春融堂集》卷六十，《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》。

〔一二〕羅繼祖編《朱笥河先生年譜》乾隆三十六年條。

〔一三〕邵晉涵《南江文鈔》，陳壽祺《南江詩文鈔序》。

〔一四〕洪亮吉《卷施閣文甲集》卷九，《邵學士家傳》。

〔一五〕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四十三，《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》。

〔一六〕《清史稿》卷三八〇，《孫爾準列傳》。

〔一七〕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四十三，《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》。

〔一八〕姚瑩《東溟外集》。

〔一九〕江藩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《邵晉涵傳》。

〔二〇〕章學誠《章氏遺書》卷十八，《邵與桐別傳》。

〔二一〕阮元《擘經室二集》卷七，《南江邵氏遺書序》。

〔二二〕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四十三，《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》。

〔二三〕邵晉涵《南江文鈔》，陳壽祺《南江詩文鈔序》。

〔二四〕關於邵晉涵的著述，人言人殊。這裡主要根據錢大昕、洪亮吉、阮元、章貽選、李慈銘、孫殿起等人看法，比較異同，折衷其說。因篇幅之故，不便展開論述。

〔二五〕據黃雲眉《清邵二雲先生晉涵年譜》載，《大俞山房詩稿》附有邵先生便札三通，其一囑咐同鄉黃稚圭校正該書，云『晉涵近刻《爾雅正義》，略仿唐人體裁，而學術不逮古人遠甚，刻成覆覈，自愧疎漏。今寄呈一部，伏祁大加誨削，俾不至終身不聞大道，幸甚幸甚』。

〔二六〕陽海清、褚佩瑜、蘭秀英編《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。

總目錄

點校前言		(二)
爾雅正義		(二)
舊五代史考異		(一八五)
南江詩文鈔		(二七五)
南江札記		(三二三)
附錄		(二三二)

爾雅正義

李嘉翼

祝鴻杰

點校